

國際關係史
論文集

一九八一年四月

高永祚題



出版说明

我会于1982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南京举行了第二届年会。在这次科学讨论会上，共收到论文88篇、资料2篇、论题包括近代国际关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等。论文反映出以下的特点：(1)、加强了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2)重视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3)、对国际关系学以及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作了初步探索；(4)注意到中国外交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等某些薄弱环节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史学科的研究和建设，经我会常务理事的推荐，将其中的62篇论文汇编成册，作为《国际关系史论文集》(第二集)内部出版。因我会经费所限，联系印刷厂颇费周折，故迟至今日方得出版，敬希谅解。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一

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际关系·····	张季良 (1)
简论国际关系的方法论·····	金应忠 (9)

二

十七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剖析·····	陈文艺 (16)
论康熙的对外政策·····	张之毅 (25)
关于三次瓜分波兰·····	马英昌 (34)
评提尔西特和约·····	丁朝弼 (41)
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变化·····	光仁洪 (52)
沙俄出海争霸的历史分析·····	刘君卫 (62)
从克里米亚的吞并到克里米亚战争·····	王 新 (75)
从克里木战争的爆发看欧洲列强的勾心斗角·····	杨心树 (85)
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欧洲国际关系的特点·····	唐承运 (97)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缅英关系·····	黄祖文 (110)
由班吉到巨文岛·····	王绳祖 (122)
俾斯麦是怎样充当俄国外交奴仆的·····	王鹏飞 (129)
“光辉孤立”辨析·····	朱明权 (139)
日英同盟与日俄战争的爆发·····	张 健 (146)
日美两国在日俄战后的对立与高平—卢特协定·····	廖隆干 (153)
美国与1906年阿尔黑西拉斯会议·····	王明中 (161)
海牙和会与沙俄的外交·····	黄鸿钊 (172)
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动实质和影响·····	张荣祥 (181)

三

对俄共(布)党内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斗争的再认识·····	康玲 (188)
浅论小协约国·····	洪育沂 (197)
浅论二十年代初苏俄对德的外交策略·····	丛鹏 (20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战·····	胡毓沅 (213)
一九三三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关系·····	毕建海 (219)
略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形成·····	汪宏玉 (228)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金安泰 (234)
评“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路·····	吕万和 张 健 (246)

孤立主义与美国三十年代全球战略	王贵正 (254)
三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政策	张培义 黄乃宇 (261)
慕尼黑悲剧与斯大林外交	王 芝 (266)
美国与慕尼黑	何抗生 (276)
论远东慕尼黑阴谋	周启朋 (285)
1939年苏英法三国莫斯科军事谈判浅析	姚昆遗 (321)
1935年至1940年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	王德仁 (331)
简论一九四〇年柏林条约	周希奋 (345)
论《苏日中立条约》	张兴伯 (352)
“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形成其破灭	吕万和 崔树菊 (360)
论1940—1942年英美与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的关系	萨本仁 (369)
日美矛盾的发展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李树藩 (378)
论第二战场问题	石 磊 (385)
租借法案始末	张紫瞳 (401)
罗斯福政府谋求战后对欧洲政治的支配地位	顾德欣 (408)

四

试论战后国际关系史的体系和分期问题	李肇新 (418)
第三世界的兴起与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分期	俞 源 (426)
初探战后国际关系史的分期问题	陈兴耀 (433)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分期问题	沈学善 (437)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79)纲要	孙叔林 (443)
试论冷战起源	霍光汉 符文洋 (461)
雅尔塔会议前后苏联东欧政策	魏能涛 (470)
评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	赵平安 (478)
战后苏联对东亚的战略	胡之澄 (483)
“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政策	刘同舜 (490)
北约的性质及作用初探	龚维新 陈佩尧 (498)
马歇尔“调处”真相	吴东之 (5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德和解的影响与发展趋向	张运城 (513)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实政治	丁诗传 (521)
战后美国对非洲之角的政策	梁根成 (528)
苏联远洋进攻战略在推行霸权扩张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德福 (544)
苏联南下印度洋的历史过程	杨 铮 (551)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王大可 赵振军 (559)
尼克松主义与美苏争霸	谢政仁 (568)

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 张季良

近两年来，在教学工作和学术讨论中，常常看到对国际关系方面的某些问题，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时争论双方掌握和使用的材料都差不多，但看法却很不一致。我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各人的观点和方法不无相同，或大不相同。

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政治性很强。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那就势必要用其他的理论作指导，不管我们自觉或不自觉，都是这样。

这几年，我们通过学术交流和外文书刊的进口，接触到大量外国的观点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活跃思想，开阔眼界很有好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同志缺乏鉴别能力，在不同的观点面前感到无所适从，有的甚至全盘照搬国外的观点。这样，即使他广征博引了大量的材料，结果他的立论仍难免失之偏颇。

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研究国际关系，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学者的根本区别。尽管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难免有这样和那样的失误，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现在和今后都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指南。

去年，我在我院研究生班和本科两个年级，就如何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想法。现将这几次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发表，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正确认识时代的性质

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这是我们正确分析当前国际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制订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如果对这个问题认识模糊，那么我们对这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就无法做出清醒的分析和判断，更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

我们党一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可是，有的人怀疑这个论断。他们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已经过时。他们说，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这些看法是不妥当的。

首先，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从1914年到1917年，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和《修改党纲的材料》等著作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阐述。列宁一方面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开始”⁽¹⁾。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帝国主义还“没有完全衰朽”，“没有死亡”⁽²⁾，还可能发展更快，“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³⁾。列宁指出：如果以为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

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⁴⁾。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1924年对世界革命形势，曾有过过分乐观的估计。但1925年他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就改正了不恰当的提法。他在会上指出：“列宁说过，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时代”，“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而且应当有革命的退潮和来潮”⁽⁵⁾。可见，列宁并不认为帝国主义已经死亡，或很快就会死亡，而是根据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分析它的历史地位和必然趋势。现在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列宁这一论断呢？

其次，从战后几十年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战后世界的确有许多新现象。我们对这些新现象不应该视而不见，而应该认真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七十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结束了它战后二十年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滞胀”时期。八十年代初又爆发的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些情况完全可以说明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和资本主义的腐朽程度。

从国际关系中几大矛盾的发展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看。战后三十多年来，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作用不是加强了，而是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发展，影响在扩大。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亚、非、拉三大洲的被压迫民族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宣告独立，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旧的国际经济体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开始

取得重大的突破。这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如果我们只看到帝国主义表面的、暂时的繁荣景象，只看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对于上述重大变化没有足够的估计，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研究国际问题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呢？

二、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

当我们评价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时，往往由于根据不同的理论观点，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看法。例如，有的人认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就是“民族利己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的人则认为，一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应该完全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引用资产阶级宣扬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作为立论的依据。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类问题？我看，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维护国家的利益，而在于维护什么性质的国家利益，怎样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但他们又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⁶⁾。恩格斯还以当时的波兰为例，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⁷⁾。

列宁对不同含义、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国家加以严格区别，并阐明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写道，“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感到

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一再揭露第二国际用“保卫祖国”的口号做掩饰，保卫“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指出他们“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对待两种不同的国家，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列宁充满了由衷的热爱；而对于沙皇专政的国家机器，列宁则采取了根本否定的立场。

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过去对待沙皇政府的态度根本不同。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是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护国派”。列宁说：在我们还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的时候，我们从原则上否定保卫国家。“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10）。他特别强调，保住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健康的婴儿，就是对各国无产阶级最好的、最有力的支援。

列宁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主张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坚决反对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他主张“按照人类平等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居”（11）。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护国主义者”，“我们维护的不是大国主义”（12），“我们保卫的不是掠夺他国人民的权利”（13）。这样，列宁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划清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界限。

中国共产党一向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主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

主义者。他还特别指出：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当时的日本和德国共产党人应当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使他们的战争归于失败，“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这不仅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为保卫祖国而战，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使本民族得到解放，“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4）。

新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尊严和荣誉，反对外来干涉，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同时一再强调，中国在国际交往方面要消灭大国主义，永远不称霸。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

可见，一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为了本国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既不丧权辱国，又不搞大国主义，这就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评价一国对外政策的标准。

三、国际斗争有无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

有的人主张究研国际关系、评价人物和事件，应该以成败得失为准绳，而不应该以是非曲直为依据。他们认为，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只能讲利害得失，而不能讲伦理道德。有的甚至说国际关系中，力量决定一切。这实质上是公开宣扬“强权即公理”的谬论。

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当然要重视力量对比，重视加强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但是我们一向认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¹⁵⁾。中国有句古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节节失败，苏联和越南分别陷入阿富汗、柬埔寨泥潭而不能自拔，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薄弱，而是因为他们师出无名，首先在政治上打了败仗。

我们处理对外关系，当然要考虑到利弊得失，注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但是，我们更加重视原则和道义。我们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我们一向反对见利忘义，拿原则做交易。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曾经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反对封建势力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丘吉尔为了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发表了《大西洋宪章》，提出了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等一系列诺言。事实上，丘吉尔只把它当作宣传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凭借实力，公开支持蒋介石、李承晚反动独裁政权，再也无法用“民主”、“自由”为自己辩解，于是“政治现实主义”应运而生。他们赤裸裸地把力量决定一切、利害高于道德，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而已。过去他们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而现在则公开扯下了遮羞布。

四、“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陈云同志说：“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①，这是至理名言，也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作，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我想，我们研究国际问题也应当采取这种严肃的唯物主义态度。

“不唯上”并不是不应该很好领会领导同志有关国际问题的看法。问题是我们不能把研究工作局限于为印证领导同志的看法收集材料。列宁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论点”，因此，不应当只引用个别的材料来说明客观情况^③。我们国际关系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详细地占有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看法，供党和政府参考。如果我们害怕艰苦，害怕风险，仅仅满足于收集一些零碎材料来说明某些领导同志的某些看法，那么，这种研究工作不仅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可能给党和政府工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不唯书”并不是不读书。毫无疑问，我们对革命导师、革命领袖的著作一定要认真学习。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革命导师发表某一篇著作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有些看法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学习他们的著作，是为了从那些著作中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切不可从中找出片言只句，作为我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研究国际关系，当然要阅读大量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往往只能反映客观事物的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甚至是一些假象。即使各国政府的外交档案材料也是如此。而外交档案的公布，更是根据公布者的利益和要求加以选择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地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外国人写的文章、著作、回忆录都有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立场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以及记忆或技术上的差错,这些材料常常带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对这些材料就不能完全相信,全盘照搬,而应该尽量多看几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比较和鉴别。

要做到“唯实”,还要注意不能受个人的感情、愿望和成见所左右。不要因为自己赞赏某一个国家的政府或某一个人物,就专门收集对其有利的材料;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恶感,就专门收集对其不利的材料。在我们研究工作中,这种主观主义的毛病很顽固,很难根治。治疗的办法就是多听听不同的意见,常常提醒自己:从不同角度想一想、看一看。

五、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唯物史观观察阶级社会生活的根本方法,我们研究国际关系也不能离开这个方法。

例如,怎样看国与国的关系,就要作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或人口的自然集合体,它具有阶级性。每一个国家都代表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国与国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

又如,怎样看国际格局。不少人说,过去是“两极结构”,现在是“多极结构”或“五大中心”。这种说法仅仅说明了国际格局的现象,而没有表明“两极”或“多极”结构究竟反映了什么阶级内容?它与国际社会过去出现过的“两极”或“多极”结构有无区别和有何区别。事实上,当代国际格局“多极结构”的性质,与十九世纪欧洲的“多极结构”和二次大战前夕的“多极结构”,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中找到它们的共同点或类似之处,但我们更应该

研究当代“多极结构”的特殊性,研究它的阶级内容,研究几个极或几个中心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再如,国际冲突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很多国际冲突,表面上非常类似,而阶级内容却根本不同。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这篇文章中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资产阶级上升阶段一样,“但是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变了”,“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极反动的、垂死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衰落的财政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代替”(19)。如果对这些国际冲突不作阶级分析,那就看不到这些冲突在阶级内容方面的根本区别。

再如,怎样看美国对华政策?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究竟是“友好”还是侵略?在中美建交以后,为什么美国又制订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为什么有些美国人念念不忘把我国的台湾省当作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于这些问题,只要进行阶级分析就不难理解了。

还有,怎样看日本加强武装力量的问题,从当前情况看,应该说,主要是为了对付外来的威胁,是防御性质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现在日本有些并非无足轻重的人物,在政府支持的集会上,公开宣扬“八纮一宇”这种军国主义的老调。这反映了日本确有一股反动势力妄图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

实际上,资产阶级也站在它们的立场上,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丘吉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鼓吹把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夕,为“共产党正在抬头”而忧心忡忡。杜勒斯叫嚷“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以“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性质”。这都反映了他们鲜明的阶级观点。但是,资产阶级学者通常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相反

地，他们往往标榜“超阶级”的“客观”“公正”。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六、要十分重视经济分析，也要注意研究上层建筑和领导人物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文版序言中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的”（20）。

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强调必须“通过表面的、偶然的、混乱的现象”，揭示事件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内容。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21），如果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22）。

列宁逝世后六十年来，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的国家机器及其对外政策，更加成为垄断资产阶级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工具。特别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垄断资本进一步和国家政权结合，并日益国际化，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甚至直接出而组成国际垄断同盟。第三世界国家也建立各种国际组织，为维护和发展民族经济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对外政策，更加受该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国际谈判常常既有政治内容，又有经济内容。有些会议，如南北对话，更是主要谈经济问题。因此，我

们研究国际关系，决不能仅限于政治关系，而应该把研究经济关系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并十分重视分析国际事件的经济原因。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们不能只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和领导人物的重要作用。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全面而又深刻地阐述了这个原理。他强调指出：如果把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3）。恩格斯说：“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24）。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还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历史事变就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的结果（25）。

事实上，一个国家及其对外关系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仅仅寻找经济方面的原因，很难解释清楚。同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的对外政策不仅有共同点，还有不同点；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对外政策也不会完全一样，甚至有很大差别。在这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文化、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作用。如果硬要用经济因素说明一切现象，那么我们的论证一定会牵强附会，甚至滑稽可笑。

在这里，我想要着重讲一下领导人物的作用问题。革命导师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对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不应有任何怀疑。但他们同时重视个人、尤其是领导人物的作用。马克思很赞同爱尔维修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²⁶⁾。列宁说，“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²⁷⁾。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代表着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又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为了实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内外政策，他们执行政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一模一样。他们的作用也是有好有坏，有大有小。即使同是美国民主党人的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也是各有自己的特点，起着不同的作用。如果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或一国的对外政策，不研究那些领导人的个性、风格和政策方面特点，不区别分析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不同作用，就不可能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不可能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七、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

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²⁸⁾。我看，这也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根本方法。

全面的方法，首先要求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局部，不看全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他的茅庐中初见刘备，就从战略全局上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提出了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现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密切，苏美争霸影响全球。我们研究国际问题就更不能孤立地只看一点，就事论事，而必须全局观点，分析有关各种因素，并加以综合研究。例如：1945年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和1959年美苏戴维营会谈，都是大国首脑讨论世界性问题。如果孤立地就事论事，这两个会议的性质似乎差不多。但

是，如果我们对比两次会议召开时的整个国际形势及各与会国的战略目标，就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雅尔塔会议是在全世界人民同当时最反动的势力德、日法西斯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举行的。与会国家是反法西斯联盟中的盟国。尽管他们的战略目标各种各样，比较复杂，尽管他们达成的某些协议严重地损害别国主权，但他们在战胜德、日法西斯这个总目标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就协调战略计划、根除法西斯势力达成了一些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协议。而1959年的戴维营会谈，则是赫鲁晓夫企图通过谈判，谋求同当时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一次努力，这是两个超级大国既争夺又勾结的具体表现。

全面的方法，还要求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既不要简单肯定，也不要简单否定。应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看到它的不同的方面，然后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给客观事物以全面的适当的评价。例如，对于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我们既要看到斯大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应该看到，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确实有其成功之处。它不仅为苏联医治战争创伤，恢复与发展经济，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对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斗争，打击了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而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不可抹煞的，也是抹煞不了的。

关于历史的方法，列宁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²⁹⁾。毛泽东同志也说过：研究历史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³⁰⁾。这也是对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要求。

研究国际关系不能片面强调阶级分析，

从而抹煞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积极作用。只有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把人物、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即结合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分析其作用和影响,这样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不能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抹煞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为尼克松素以反共著称而抹煞他在打开中美关系方面的作用。

历史的方法还要求我们注意,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作出不同的评价。列宁对拿破仑战争性质的分析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范例。他指出,这场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是保卫伟大革命的革命战争。但“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³¹⁾战后越南的情形也很类似。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越南先后进行的抗法、抗美战争,都是正义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而当它打败美帝国主义、统一越南以后,就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公然出兵柬埔寨,这就完全全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二次大战初期德国和英法之间战争的性质比较复杂,但也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39年到1940年,英法同德国的“奇怪的战争”,虽然带有反法西斯的性质,但更多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明争暗斗。而当希特勒进军巴黎,狂轰英伦三岛的时候,这时英法对德战争的性质就发生变化。如果认为当时英法为保卫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那就是没有看到客观事物的质的变化。这种看法,不仅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能为浴血奋战的英法两国人民所接受。

最后我想讲一点: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中,国际关系问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内容十分丰富。我个人学习得很差。挖掘这个宝库,联系实际地加以研究整理,这是我国学术界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注

-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5页。
- (2)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1页。
-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4页。
-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2页。
- (5)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6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4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1页。
- (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0页。
- (9)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6页。
- (1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页。
- (1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1页。
- (12) 《列宁论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75页。
- (13)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页。
-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83页。
-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32页。
- (16)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3页。
-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21—522页。
- (1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3页。
- (19)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页。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9页。
- (2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5页。
- (22) 同上,第731页。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 (25) 同上,第478页。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 (27)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 (28)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 (29) 《列宁全集》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页。
- (30)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 (31) 《列宁全集》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2页。

简论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 金应忠

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中颇为热门的一个领域，各种主张名目繁多，甚至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些主张有人把它们归纳为四类：①历史的记述的方法；②分析的理论的方法；③综合的实际的方法；④统计的数学的方法。谁优谁劣，也无法做出一个统一的定论。因此日本的学者不能不说：“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应当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结论就西方国际关系学而言，是颇为实际的，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而言，恐怕得另当别论，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考察国际社会，阐述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规律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使国际关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本文拟从这种科学的方法的不同侧面的理论基础和功能，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师长。

首先，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把国际关系的研究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

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马克思认为，国家、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它们是劳动分子的产物，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也有各种不同的国家，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民族和国家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民族间和国家间关系质的规定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间和国家间关系质的规定性又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一旦国际社会中世界各民族已经融为一体，国家消亡了，那么现在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不只是民族和国家，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体空前增加，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几乎容纳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地区性的军事、政治、经济的组织和集团。……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几乎都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具有独特的功能。否认这些角色的功能和影响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些角色的出现，都是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要尊重历史就要正视这些角色。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些角色的历史地位作具体的考察，但有一点可以指出，当产生这些角色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角色的历史地位和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在二战大战前，国联曾经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颜色，但是二次大战一来，这个角色便消踪匿迹了。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来考察国际关系的各类角色，同样也是不现实的。

不仅每个行为角色都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且每个行为角色都有自己的历史运动过程，只有认真研究这些过程，才能对其功能和地位作出科学的说明。例如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现代民族是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巩固起来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与现代民族出现的同时，是民族国家的出现。不建立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民族

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民族问题上的第一个趋向。

但是资产阶级在争得本民族的自决权以后，却把民族压迫的枷锁套到了其它民族的头上，没有对其它民族的压迫和掠夺，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的分割，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方的扩张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使资本帝国主义时期里在民族问题上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趋向，为数甚少的拥有巨额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谋求日益扩大对其它民族的特权，而为数甚多的被压迫民族则是为谋求本民族的独立自主的权利而斗争；后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所出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并且日益发展成为巨大无比的历史潮流。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发展到今天，已经使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原来的殖民地附属国赢得了政治上独立的权利。但是只要世界上还有霸权主义在那里横行霸道，只要这些国家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充分自主发展的权利，旧的世界经济秩序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要旧的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只要这些国家因人民曾处在无权的地位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内容在实际上还没有被废除，那么这个趋向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

解决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和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前者，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独立权，即被压迫民族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有自由分离的权利，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后者是已经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国家，有独立自主地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发展自己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和社会发展事业，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对内对外的决策，既不依附于任

何集团和势力，也不受任何集团和势力的支配和控制。因为这两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要保障世界和平，首先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作主。

2. 不排除民族压迫、无产阶级的正常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就不可能，排除民族压迫是国际无产阶级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因为民族的反感，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仇恨只有在各民族间彻底确立了完全的民主关系以后才会消失。因此没有什么此对待民族不公平更能阻挠无产阶级的团结的发展和巩固了。“受侮辱”的人对平等感、对自己的无产阶级破坏这一平等（哪怕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是最敏感的。

3. 只有在被压迫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才能获得新的起点，它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来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的改造。整个被压迫民族在政治上争得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在经济上和社会发展上争得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的权利，必然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

4. 就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而言，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当垄断资本驱使本民族的居民为之效益的时候，真正得益的是一小撮资本的寡头。尽管这些民族的居民也可能得到某些实惠，但是当垄断资本的统治者在玩弄民族偏见，对外进行海盗式战争的时候，挥霍的正是人民的血汗和财产。当压迫民族的某些居民陶醉于本民族的“成就”的时候，垄断资本却居此维护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所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观点是“压迫其它民族的民族是没有自由的。”从压迫民族中取得额外利润，是

资本帝国主义财力的主要源泉，当这种财源完全枯竭时，那么压迫民族争得真正的自由和彻底解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毫无疑问，民族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建立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事业，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唯一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还认为存在着另一个趋势，即民族融合的趋势。

1. 资本的扩张，首先的表现就是打破民族的壁垒、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地方特征，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向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趋向消失、最终为民族的融合奠定物质基础。

2. 在实际生活中、当我们看到股份公司里，各民族的资本家都是坐在一起，彼此十分融洽，在工厂里、各民族的工人都是在一起工作的，同是雇佣劳动者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确实存在着的。

但是，民族融合就一种历史趋势来说，却是一种历史运动的一个过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真正完全的民族融合。任何民族都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全世界的联合，这当然是很美妙的，是会实现的事情，但只能出现在共产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上。遵从历史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要争得民族真正独立自由，争得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争得无产阶级在本国范围内的统治，不容许任何形式的特权（控制权、占有权、支配权），其次才是坚持国际主义，坚持国际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坚持国际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联合。这种国际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实现“自愿的联合”。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就是不容

许有爱国沙文主义，不容许有民族利己主义。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任意侵犯别国的主权，占有别国的利益，干涉别国的内政，支配别国的行动，己所勿欲而施于人，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宣扬向压迫屈服。因而就民族融合的趋势而言，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国际主义即各民族的高度统一的溶合来代替一切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运动。国际主义就其理想目标而言，是一种未来的国际社会体系，那时民族国家消亡了，民族也融合了，是一种真正大同世界。就其实践而言，在民族关系上，在民族国家的关系上，只能实现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容许实现的那种程度。既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又要循着历史必由之路；理想代替现实，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不仅考察各类角色的历史地位要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而且考察这些角色的行为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一定的历史范围是各类角色生命运动的物质基础。要使我们思想不陷入主观臆断，就得研究各类角色行为运动的客观历史条件。

一定社会的国际关系行为角色产生和生命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所以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方法论认为还必须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同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研究结合起来。

当国际关系的角色处在相互隔绝状态时，就谈不上是一个国际社会，只能说是一个世界。现代统一整体性的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国家有可能在国家间的关系上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国家间的联系虽有所发展，矛盾和冲突也有发生，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有限和局部的。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寻求国外市场是每个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自发趋向。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地超出

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破坏了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用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取代了内在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

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是以从属性的国际体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欧洲首先发展起来的,尔后又扩展到北美,开始了现代资产阶级西方文明的时代。就世界范围而言,辽阔的东方却还处在封建的农民国家,非洲被贬为“黑暗的大陆”。西方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极其便利,把东方的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资产阶级民族中来,它的廉价的商品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使未开花和半开花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是延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殖民主义史,在这种国际体系下,欧洲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代名词。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资本的生命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的运动,所以研究资本的对抗对研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国际社会的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资本的对抗中,各个企业的竞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成者自己破产,或者使别人破产;各个国家之间也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或者被征服和兼并,受别国所支配,或者使其它国家破产,并征服它们,控制它们,取得“大国”的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资本家不得走上分割世界以便获利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中,
①资本的利息是至高无上的。资本利益的需要,造成了这种或那种的矛盾和冲突,甚至

相互厮杀,也可以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妥协,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这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基本的论点,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②资本的利息是全球性的,不仅弱小民族和国家成了被奴役、被兼并、被支配的对象,即使相对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了被欺侮、干涉、侵略、支配、控制、兼并的对象,迫使这些国家处于从属的地位。无论是对抗还是联盟均达到了全球的规模。③资本利益的需要是全面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和文化意识的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甚至外层空间,海中生物,洋底资源,几乎都成了资本的掠夺物,是全面的霸权。

一定生产方式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特征,也会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标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和垄断给全世界各地带来的均是统治的趋向,不仅加剧了整个国际体系的从属性,而且也加剧了国家间关系的从属性,国际关系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小撮最富的国家压迫全世界,国家间的对立也简单化了。帝国主义造成了这样一个新时代,不仅使世界上大小不同的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剥削压迫别人的国家,是占少数的国家,一类是受别人欺侮、干涉、侵略、支配、控制、兼并的国家,除了殖民地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依附国,它们在政治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面且也使世界大小不同的民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占少数的民族,压迫别人,实行大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有全权和特权的民族,另一类占绝对多数的民族,是被压迫的、附属的或半附属的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

当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国际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的变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而在

一定范围内结束了资本的统治，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因资本的生命运动而形成的在海外谋求特殊利益和特殊权利的经济根源，因而它有可能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它有可能取得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信任、同情和支持、并同他们结成联盟。

由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首先是在国内社会内部实现的，所以国内社会的根本变革成了国际关系根本变革的标志。如同英国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取代封建的国际关系，在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终将取代其它的国际关系。

今天世界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关系。这种多重性质的国际关系并存的局面，正是资本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趋向灭亡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由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所以国际关系的类型的划分，大体上也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相吻合。在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到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了，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除此之外，其间国际关系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奴隶制型的国际关系，封建主义型的国际关系，资本主义型的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型的国际关系。

第三，必须把国际关系的研究同阶级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

在国际社会中，阶级并不独立地构成行为的主体，而是通过各类角色来体现的。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民族、国家等等。凡是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独立活动能力和独立功能的共同体和组织，均可以认作国际行为主体。但是不管怎么多种多样，在阶级社会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对立，以及它们内部的联系和对立，都是由阶级的联系、对立和矛盾所引起的，以

不同的形式反映了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因此，只要阶级的对立和冲突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发展必然具有双重的推动力和性质。这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中表现更为明显。

1. 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社会内，一方面要同其它阶级进行战斗，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也进行着持续的战斗，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存在着持久的相互矛盾和冲突。资本利益的矛盾对抗性决定了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不可克服性。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是资本家各自追逐罪恶计划的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但是国内社会的阶级矛盾发展的需要，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与追求国际目标几乎具有同等的价值。

2. 资产阶级国家间，或者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便在新的领域中展开竞争，或者由于资本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作某些调整对资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更为有利，成立某些妥协，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同时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资产者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也可以友爱地提携起来。

3.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不仅要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还受到国际资本的统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本国范围争得自己的统治，改变了自己国家的性质，否定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国际资本势力。

4.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本质上是和平的对外政策，愿意同所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但是它的存在和发展，国际资本总感到是自己利益的损害，自己统治的威胁，所以对立和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获得某种均势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